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信達出版社印行

第一部分 毛澤東思想論稿

序言

- 一、寫在前面
 - 二、論個人崇拜
 - 三、毛澤東思想的來源與組成
 - 四、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
 - 五、高明的戰術家
 - 六、不高明的戰略家（上篇）
 - 七、不高明的戰略家（下篇）
 - 八、理論與實踐
 - 九、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
 - 十、自力更生與「一國共產主義」
 - 十一、歷史地位——論風流人物
- 附錄：我們對於人民公社的認識與態度

序 言

本書取名《論稿》。顧名思義，可知它不是普通那種章節分明、體裁劃一、組織謹嚴、前後密切呼應、從任何角度說來都已經是完備的一部著作。

一年前，當本書有關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的四章以「三原」筆名先行出版時，我曾經說過，這整部作品只是一個相當大的企圖，企圖對毛澤東思想作一種全面的、客觀的與「歷史的研究」。這樣說既非自謙，亦非自負。它確是一種鄭重與虛心的研究，但確實還只能說是企圖罷了。所以然者，第一因為作者體力關係，疾病時常打斷工作，一攔往往歷數月或半年之久。因此，這本中等長度的書，自從1961年1月動手，直到1964年8月方才寫完，前後耗時共三年有七個月。如此寫法，要想作品在體制上如何統一，文字上如何完美，在敘述上絕無重出，那是很難做到的。第二，因為作者被迫居住在一個閉塞的地方，材料搜集困難，參考書不易充分獲得，以致有些問題或某些事實，不得不因此而撇開不談，或暫不討論。有此限制，當然會影響作品的全面性與完備性的。

由於自己對作品的上述不滿，稿子雖然寫成了將近十年，始終任它放置，不曾作出版打算，事實上當然也沒有出版的可能。

去年秋，經友人慫恿，並得信達出版社協助，終於先將有關中蘇衝突的四章出版了。我的一部分稿子，以此總算和比較廣大的讀者結了緣。結果，經出版者與銷售者的反映，倒不如預料之壞，這本小書似乎還能獲得某些讀者的歡迎。有些人看了該書序文，知道除此四章外尚有十數章未曾付印，他們竟向出版人或經售者提出要求，催促出版，希望儘早看到全稿。更有些熱心朋友，竟付款預定，俾助印刷所需。

這樣的熱情深深地感動着我。它讓我體會到了一件事：一個作品，只要作者是鄭重其事的，本着科學良心的，不懷有別種用心的，真想說些同時只想說些自己確認為真理的東西的，那末，縱然它在體裁上鬆些，結構上散些，或文字上差些，都會有真心的讀者歡喜，甚至還真會有人賞識。這個體會驅散了我多年深陷的孤獨感，它讓我知道了世間尚有同道在——決心將餘稿全部付印了。

不過，這部稿子寫成迄今，畢竟已經八年多了。是否應該根據八年多來新發生的史實，將全稿重新校訂或補充一下呢？懷着這樣的目的，我最近將全稿重讀一遍，卻發現這樣做是既無可能，亦非必要。無可能，因為一髮動全身，牽涉太廣，改不勝改；非必要，因為本書寫作的最初計劃就是學術性的，就是從問題的根本着眼的，八年來新的史實只能證實我們的基本論斷，毋須乎用新的史實來修改我們對根本問題的看法。

因此，本書便完全照八年前寫完時候的原樣出版了。

從本書完稿到目前付印這段時間內，發生了許多有關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是毛澤東思想的精彩表現之一。按理，《論稿》中應該為此添一專論，或至少在已有文字中增加一些有關此事的評論。可是一因本書作者對「文化大革命」已另有專文，文字太長，不便用作本書附錄；二因在既有文字中增添特殊段落或冗長注釋，將使《論稿》更加龐雜，令人無法卒讀，所以我都不曾這樣做。

其實，我們雖然不特別討論「文化大革命」，本書中所曾討論的有關毛澤東思想的種種方面，尤其關於毛澤東在文藝、經濟以及「人民公社」方面的思想，已經頗足以幫助讀者們去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脈了。甚至可以這樣說，只當人們弄清楚像我們所指出的毛澤東思想的諸般特徵之後，才能正確地了解這個「大革命」，才能了解它發生的原因，它所採取的形式，它所經歷的過程，以及它的趨向與它的全盤意義。

在這裏，我們自然不能具體地說明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在各個方面的關係。不過抽象地，我們卻立即可以指出來：毛澤東性格上與思想上的優點與缺點，長處與短處，時而相輔相成，時而此長彼消，它們交互錯綜着，迭為雄長地，像幽靈一般飄盪在整個運動之上，或者像靈魂一般作用於全部運動之中。試想想，如果不是想實行「一國共產主義」，如何能在國內造成如此深刻與眾多的矛盾？如果不是毛氏的「經濟的浪漫主義」想一步登天，如何能造成長達三年的「特大災害」？如果沒有造成這些災害性的錯誤，黨領導又怎能落入「走資派」之手？失權之後，如果沒有敢作敢為、乾坤一擲的氣概，誰又能做出如此規模的「革命大彩排」？等到「彩排」變成正戲，「欽定造反」

又轉變為真正革命之勢的時候，始則用槍桿子「平亂」，繼而以黨的名義制軍，如此經營，如果不是策略聖手，權術大師，又怎能運用得如此得心應手？同時，如果不是斥原則為教條，以理論為幌子的人，又如何能這樣忽左忽右，出爾反爾？……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可以提出一大串的。

當然，我們絕不以為「文化大革命」乃「毛澤東思想」所一手造成，也不以為「毛澤東思想」的特徵便可解釋「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我們決不會這樣想，因為這種想法是唯心主義的，是「英雄史觀」的；它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無共通之點。個人，無論多麼重要與偉大的個人，其作用總是有限度的。對於一般的中國革命，或對於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無疑都起過作用，都發生了影響，都留下了記印。但很顯然，這些作用、影響和印記，縱然十分巨大深刻，卻決不能說是決定性的，更不能說是獨一無二的。歸根結蒂，客觀的條件總決定着主觀的意圖，歷史和社會的「形勢」，總強於任何偉大人物的計謀。因此，在整個的中國革命中，特別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誰要想拿毛澤東的性格和思想來說明其中的許多問題，無論解釋其有利於革命的方面或指出其為害於革命的方面，都必須牢牢保住着一個限度，必須時時記住「存在決定思想」那個命題，必須時時懂得從中國與全世界的種種特殊情形和關係，去觀看毛澤東思想中此一或彼一見解的正確和謬誤。只有站穩在這個立場上，我們才能反過來，正確地將某一或某些毛澤東思想去解釋中國革命，特別是去解釋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現象與性質。

在全部《論稿》中，作者自信還能始終保持這樣一個立場的，因而我相信它不但能幫助讀者們拿這樣的毛澤東思想去了解過去，而且能憑以解釋今日一切與毛澤東有關的事變。

稿子寫成，曾經請不少朋友閱讀過，他們大多給我提出了一些寶貴意見：或者指出引文上的錯誤，或者糾正事實上的出入，亦有在看法上表示異見提出來與作者商酌的。凡此種種，都會有助於本書的寫成，我謹在此對所有這些朋友表示謝意。

1972年12月7日雙山序

一、寫在前面

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政治史上發生了巨大影響，目前，正在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發生着巨大影響，將來，那個影響還一定會繼續的。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思想，值得人們之精詳研究，自不待言。

中共把研究毛澤東思想當作一個「最主要的政治任務」提出來。與《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相配合，一個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更掀起在全黨全民之中。對於這樣的任務和運動，我們該作怎樣的看法？如果我們認為毛氏的生平及其思想值得精詳研究，那末對於中共的這個研究運動是否贊同與擁護呢？

研究毛澤東思想與中共大張旗鼓提倡着的毛澤東思想研究運動，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應該是科學性的，而後者則完全是政策性的。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是一回事，懷着神化目的，以建立「永不錯誤」的權威為目的，因而材料經過選擇，甚至經過篡改，研究被納入一定軌轍，討論必須在「領導」之下，這樣的研究學習，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們主張前一種研究，反對後一種研究。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不但能確定歷史的真相，

能使人從事變的發展中得出規律，從而得出教訓，並且能使這樣的規律和教訓，應用於其他國家中，特別是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中，使那些國家中的工農大眾，也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不但能使一些掩蓋在狹隘派別利益的宣傳下面的真相得以恢復，使三十餘年來有關中國革命的各派思想，特別是史大林與托洛次基二人所代表的思想，獲得公平的證驗，並且據我們看來，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歷史地位，反而會因此有所提高，不會因之而降低，因為「始終正確」的「神」沒有生命，而有錯有對，特別是錯得比人少對得比人多的「人」，卻是有偉大生命的。可惜，今天中共（其實是毛澤東自己）所發動的那種思想研究，其目的顯然不是要確立毛澤東這個人的整個內容及其成長過程，而是要把這個人變成神，要把一個有生命有血肉的人和思想，變成為無生命無血肉的神和神話。

中共不諱言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運動是一個政治任務。不過他們沒有把這個政治任務的真實內容說出來，他們不敢說這是要確立和鞏固廣大群眾對於毛澤東的一尊的崇拜。這樣一個任務，在我們看來是反動的。

我們反對以「造神」為目的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卻要做信實的、科學的與歷史性的毛澤東思想研究。不過着手做這樣研究之時，我們卻遇到了幾乎難以克服的困難，那就是：需要材料太多，而作者今日所處的環境卻難於接觸到所有必需的材料；少數能夠獲致的材料，又都是經過化妝手術的，難於知道其中保存着多少真面目。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毛氏本人的著作，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卻只有精選過的四冊，而這些選出來的文章，「其中有些在文字方面着者曾作了一些技術性的修改（見1951年版《毛澤東選集》的出版說明），「也

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的補充和修改」（見1953年版《選集》的出版說明）。究竟怎樣才算是「技術性」的？「補充」了什麼？作了怎樣的「修改」？選集中完全不給標準，也根本不曾注明。因此，當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時候，我們就無法知道究竟哪一些是事先預見，哪一些是「過後方知」。不能確切知道這一些，就大大妨礙了我們研究工作中想要做到的「信實的」、「科學的」與「歷史的」這些個守則，因此在我們書中的某些判斷，有時只能採取保留式的，假定性的態度。

毛澤東為什麼只出選集而不出全集，據出版委員會的聲明，乃「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革命文獻的毀滅，由於在長期戰爭中革命文獻的散失」，以致「現在還不能夠找到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著作」。上述無疑是一個理由，但決不是主要理由。毛澤東不學列寧以及蘇聯其他領袖的樣。不出版全集而出版選集，其最主要理由我以為是：實踐重於理論、策略重於原則的毛澤東，前後文章中有的矛盾和不一貫的地方，今日之我常與昨日之我為敵的；同時過去當作手段而採取的許多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卑恭詞令、態度和立場，在今日勝利後看起來是太礙眼了，特別在年輕一輩革命者的眼中，這些文字會大大損害他們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為要建立「一貫正確」與「永遠正確」的神話起見，這樣的選擇便被認作是必要的了。

不用說，這種動機和辦法都是非常不好的。即使不是為了歷史的真實，而是為了教育年輕的革命者，也是非常不對的。因為正確的事例固然可以教育人，而不正確的事例（只要如實地指出其改變經過），卻具有更大的教育價值呢。人不能從神的奇蹟中獲取經驗，卻能從人的事蹟中學習教訓。可惜一切中了個人崇拜毒的政治家，一切為個人崇拜所支配了的制度，總是不明白這個最淺近的道理。

一個作家，當他將自己的作品彙編出版時，是否可以選擇？是否可以補充和修改？這，首先得看是什麼性質的作家，得看是什麼性質的作品。如果是文學或科學的作家，如果那些作品與人與事無關，也不帶有爭論性質，那末，作者自然有充分選擇與修訂補充的自由。甚至還應該這樣做，以便精益求精，力圖以最完美，最正確的形式和內容跟讀者們相見。可是，政治家的政論文章，有關於歷史事變，具有了歷史的文獻意義，更或牽涉到與別人的論爭，已構成了關於是非曲直的相當定案的，那就不應該作任何事後修正。即使是技術性的修改，也應該以注解方式出之，或修改後附以未修改的原文。作者們這樣做，並非為了什麼道德教條之故，而是對歷史的忠實，對思想的負責。這個態度，每一個認真的政治思想家（甚至是科學思想家）都必須具備的。否則便談不上什麼「科學的良心」，談不上光明磊落的責任心。史大林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犯了無數罪惡，其中最重大者之一便是偽造歷史，偽造文獻，竄改和虛構他本人和他論敵們的文字。我們在這裏絕無意說毛澤東在這方面已犯了與史大林同樣大的罪惡，我們只是指出這種「選」和「改」的辦法不是承襲自馬克思列寧，而是仿效史大林的。毛澤東在這條岔路上走得還不很遠，是否尚有可能「回過頭來」呢？（其實他儘可不學史大林，因為他對中國革命無論實踐與理論上都確有成就，有貢獻，不像史大林必須靠十足的偽造才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史的。）

在這方面，有兩個典型例子應該舉出來，讓我們——正確些說，是讓毛澤東——學習的：

1、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的態度。大家知道，這個宣言寫成於1847年，二十五年以後，即在1872年，馬、恩二人給德文新版合寫了一篇序文，說道：宣言中某些次要段落已經過時了，「但因

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所以我們認為自己已無權加以更改。」（這一聲明，後來恩格斯又寫入 1888 年的英文版序言上。）

2、恩格斯對於《反杜林論》的態度。《反杜林論》一書的寫成，直接動機雖然為了反駁杜林，但主要卻是發揮恩格斯他自己的和馬克思的見解，這樣的書，作者當再版時原本有修改補充的完全權利與自由。但當第二版付印時，恩格斯在其序文上還是這樣說：「現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樣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雖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敘述，可是我沒有時間來做徹底的修訂。……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許我對本文作任何變動。這書是部論戰性的著作，我以為論敵既然已不能修改什麼，那我對論敵也負有責任不作任何修改。」

毛澤東的著作，除了極少數像詩詞之類以外，今天當然都已經是政治性的歷史文件，其中大多又都帶有論戰性質。然則，他對原文是否有「權」修改？他的「良心」與「責任」應該要他如何處理自己作品的出版？觀乎上述的兩個例子，答案是自明的了。

二、論個人崇拜

時勢造英雄呢，還是英雄造時勢？天定勝人呢，還是人定勝天？這兩個說法不同而意義實等的命題，一直在中國思想家的頭腦中聚訟，卻不曾得到過十分完滿的、因而可說是正確的解答。自來有些思想家傾向於那兩問題的前半截，有些則比較着重於問題的後半截。傾向前半截的就不免要強調客觀，強調氣運，強調天命；而着重後半截的當然要看重主觀，看重努力，看重人事。第一種說法是宿命的，但多少包含了一些客觀的與唯物的成分；後一說法是積極而能動的，但大多陷於純粹的主觀與唯心。

由上述兩種歷史觀所得出來的一個相當普遍的，本質上正確的倫理學的命題，那就是：「盡人事以待天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及所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這種態度雖不曾根本解決了「時勢與英雄」，「天和人的關係，但至少已經道出了二者之間的主從關係與相互關係。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毫不足怪。中國的社會長期停頓於落後的小農經濟與商業資本經濟，生產力停滯不前，以致那個所謂「時勢」與「天定」究竟是什麼東西？它們如何發生作用？如何造成與決定着「英雄」和「人」？那是無法獲得清楚正確的認識的。人類歷史只有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由它造成的較

為簡單與赤裸的階級關係，才算有了足夠條件，讓思想家們清楚地發見並確定那隱藏在歷史發展後面的「時勢」、「氣運」與「天」。

只有發現了歷史唯物論法則的馬克思派，才終於對時勢與英雄的關係問題給了滿意答覆。只有馬克思的辯證的而非機械的唯物論，才能在重客觀與重物質原因的歷史中，排斥了消極的宿命論，給人的主觀努力找到了適當地位。只有這樣，才算最後解決了歷史發展上人與物、主觀與客觀、英雄與群眾之間的迷人關係。

馬克思本人在這方面做過極高明的應用，他在那本有名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一方面反對了雨果代表的「唯人史觀」，另一方面排斥了以蒲魯東為代表的「唯物史觀」。在該書的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說過這樣的話：

雨果只是對政變事件負責發動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談諧的詈罵。事件本身在他筆下卻竟繪成了晴天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過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作用時，他就不是輕蔑而是抬舉了這個人哩。蒲魯東呢，他想要把政變描述成為先前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對於政變所作的歷史的說明，卻不知不覺地變成對於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辯解了。這樣，蒲魯東就陷於我們那班所謂客觀的歷史家所犯的錯誤。反之，我們所作的論述是說明法國的階級鬥爭怎樣創造了一些條件和形勢，使得一個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馬克思在《政變記》的正文裏，恰恰就是從法國當時的階級鬥爭所創造的、特殊的社會條件與形勢，說明了拿破崙第三這個「平凡而可笑的」人物如何變成了英雄，同時，他又指出了：正是因為這個渺

小而非偉大的人物性格，投合了當時的反動情勢的需要，以致更能相得益彰，做成許多骯髒的反動勾當。馬克思這兒是以「時勢」為主，「英雄」為輔，指出了二者的關係，因而正確地解釋了那段歷史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將馬克思的此一見解，用更簡單明瞭的字句規定下來的，據我所知，在後繼的馬克思主義者中，要算普列哈諾夫了。在他所寫的〈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

……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因為他個人的特性給了偉大的歷史事變以個別的特徵，而是因為他賦有那種特性使他最能夠為他那時代的偉大的社會需要服務，至於這些需求之所以發生，乃是一般原因與特殊原因的結果。卡萊爾在其《論英雄與英雄崇拜》的名著中，稱偉人為開始者。這是一個很適當的稱呼。一個偉人恰好是一個開始者，因為他比別人見得深遠些，期望事物比別人更強烈些，他解決那些社會心智發展的以往過程所提出來的科學問題；他指出那些由社會關係的以往發展所造成的新的社會要求，他主動地創議去滿足這些要求。他是一個英雄。但他不是這樣意義中的英雄，即他不能夠停止或改變事物的自然過程；他是這樣意義中的英雄，即他的活動乃是那不可避免的與無意識的過程之自覺的與自由的表現。這是他的全部意義之所在；這是他的整個力量之所在。但這意義是非常巨大的，其力量又是可怕的。

普列哈諾夫這兒給偉人或英雄所下的定義，同樣也解釋了像拿破崙第三那樣的貌似偉大而其實渺小的歷史人物。因為，真偉人與真英雄既然是能自覺滿足新的社會要求的人，那末另一些人，他們自覺

地滿足舊的社會要求，他們努力替某一時代中成為反動的社會要求服務，只由於階級鬥爭的特定形勢，將這樣人物暫時捧到了社會之巔，捧成為英雄偉人，——這些人，按照上述普列哈諾夫的定義，當然是既非英雄，亦不偉大。

歷史上是充滿了這等正反英雄的。而且在不少大人物身上，會同時具有正反兩種性質。只當我們牢牢把握住馬克思主義對歷史人物的上述看法，才不致「認賊作父」或「誣良為奸」；才能還英雄以英雄本色，讓民賊們無所遁形，因而給「問題人物」以正確的評價。

在我們論述毛澤東這個人物及其思想之前，稍稍回顧一下馬克思主義者對英雄人物的正確看法，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近二三十年來，正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發生了對於英雄人物的不正確的態度。在共產黨中發生了非常荒謬的個人崇拜。這種風氣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或政治經濟的學說中，都找不出任何足以辯解的藉口，因而是根本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個人崇拜這風氣開始醞釀於二十年代之初，形成於它的末期，形成於蘇共黨中，以史大林為中心。最初它之出現是為了迎合黨內鬥爭的需要——要在整整一輩代的老布爾雪維克中定出「一尊」來。這個「一尊」之需要，乃是跟着列寧之病與死而發生的。列寧原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的天然領袖。他之獲得此一地位，並非他費盡心機謀取的結果，而是因他的出類拔萃的才智，精深淵博的學識，以及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無比忠誠，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最出色的服務，極其自然地造成的。如果換句我們上面引過的普列哈諾夫的話來說，那便是：因為列寧「比別人見得深遠些，期望事物比別人更強烈些。他解決那些由社會心智發展的以往過程所提出來的科學問題；他指出那些由社會關係的以往發展所造成的新的社會要求；他主動地創議去滿足這些要求」，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了英雄，

成了領袖。因為在事實上，在實際鬥爭中，而不僅在紙面上，不僅在文字中，列寧確實證明出他比當時俄國，甚至比全國際中，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具有更充分完美的「最能夠為他那時代的偉大的社會需要服務的種種特性」，所以他的領袖地位可以說是天生的，「命定的」，無可與爭的。也因此，只要「時代的社會需要」這個客觀情勢不變，沒有一個老布爾雪維克會妄想與列寧爭奪這個地位。就算出來爭奪，也決沒有幸勝機會。

列寧本人深深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和歷史上一切真正的偉大的英雄一樣，他最看不起個人崇拜。他正好像卡萊爾所稱讚的克倫威爾一樣，最討厭「那些庸人俗子」，這些人「拼命誇耀自己，硬要別人承認他的天賦」，並且「拼命要人看在上帝面上，承認他是偉人，讓他出人頭地。」卡萊爾說：「這樣的傢伙是人世間最可憐的光景之一。」「我勸你避開這種人。他不能在僻靜的小徑上行走；除非是萬人矚目，為人驚羨，報刊上常有文章恭維他，否則他是活不下去的。」「真正的大人物絕不會希罕這些勞什子」，「鍍金的馬車，繁文褥禮，一切勢派……去你們的吧，我身中已經有太多的生命。」（以上均見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第六講）

自覺到「有太多生命」在身的列寧，無論在外表與內心都極度樸質、極度誠實、極度謙虛。不但是那深入「靈魂」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感情要他樸質、誠實與謙虛，而且因他具有真正偉大人物的多方面的特性，使他無法兼有那些浮誇、權謀與虛驕等渺小的性格。首先，因為這些渺小性格對他簡直是毫不需要的。認真富有的人，怎會喜歡鍍金的，即使是真金的小裝飾呢？在這一點上，精神的富有者與物質的富有者有多少相同之處。列寧的領袖地位不爭自在，他毋須爭，也不怕爭。他充分讓他的同輩們和他競爭——在才智上、學問上、能力

上、工作上和他競爭。他歡迎這樣的爭，因為真理愈爭愈明，同時爭的結果，十次倒有九次的真理屬於他的方面；至於真理如果屬於對手方面呢，那末他就乾脆認錯、改過。這真所謂如日月之蝕，「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時之晦，反而愈顯其明。所以列寧時代的黨內爭論，不管是非誰屬，卻從不影響爭論者的領導地位，更不曾隨之以組織的或行政的處分。至於因此而獲罪，並為之付出自由或生命的代價，那簡直是出乎最狂妄的人們狂想之外。因此，十月革命以前在黨內，革命以後則在國內外，列寧雖然享有了最高權威，但蘇聯以及所有共產黨中，都沒有個人崇拜。他自己不愛這種崇拜，不許發生這種崇拜。別人也就不會、抑且不敢拿這種淺薄惡俗的行為來損污對列寧的真誠崇敬。

列寧死了，一個不可爭衡的權威沒有了。論才識功績，托洛次基原該是最合理的繼承人。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托洛次基在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智慧、能力、功勳，甚至個人的文采氣度，都遠遠地高出於其他老布爾雪維克之上，而與列寧齊肩。在某些場合，特別在廣大群眾的心目中，他竟致超越了列寧哩。像這樣的一個「得力助手」，當主帥病廢或死亡後出來代替他的地位，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列寧病中，特別當他發見了黨政機關中嚴重的官僚化危機，並發見了史大林的專橫不忠之後，便決心要將托洛次基來填補他留下的空缺。不幸的是：在列寧下了這個決心之後才兩個月，犯了第二次中風，於是只好讓史大林拉攏了加明尼夫與齊諾維也夫，以「老布爾雪維克」，「列寧忠實弟子」的名義，組成「三頭領導」，以此排斥和打擊托洛次基。他們敢於這樣做，那是利用了托洛次基的一項「弱點」，便是：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次基曾經與列寧作過許多次理論爭執，而且組織上並不屬於布爾雪維克派。但雖如此，史大林們的此一企圖並非輕易能夠成功，

更無成功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托洛次基在具備革命領袖的諸特性這一方面，實在超過史大林們太遠了；而他憑這些特性在群眾中所已取得的威望，也比「三頭」大得無可比擬。那末，史大林怎麼辦呢？接受託洛坎基作列寧的繼承人嗎？當然不甘。（這裏是有主觀和客觀原因的。）如何才能戰勝這個顯然佔優勢的政敵呢？首先當然得破壞他在群眾中巨大的聲望。如何破壞呢？齊諾維也夫與史大林便先後發明瞭「個人崇拜」這個法寶。他們的第一步是把列寧所享有的無上民望轉變成宗教式的崇拜。將列寧這個人變成了神，當列寧未死而事實上已不能顧問一切之時，齊諾維也夫與史大林就發明了「列寧主義」，以此和另一個發明所謂「托洛次基主義」對立起來。等到列寧一死，史大林們就乾脆將列寧變成共產主義的摩罕默德，將他放在水晶棺材裏，安置在與列寧精神絕不相侔的「陵墓」中，就此「以死的列寧來反對活的列寧和托洛次基」（托氏語）。這個陰謀，得到了其他有利於此陰謀的其他條件的配合，大家知道是達到了目的的。因為在列寧身上進行了全套「個人崇拜」手術以後，他成了全知全能、永不犯錯的絕對真理之化身，成了上帝，成了基督，那末那個長期間做過他爭論對手的托洛次基，便不言而喻地、自動地成為不知不能，永遠錯誤的絕對荒謬的化身，是撒旦，是魔鬼了。而一向追隨列寧，從未對列寧說過一個「不」字的史大林、齊諾維也夫之流，自然成了彼得與保羅，托洛次基則不用說是法利賽人或猶大了。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個人崇拜」發生於蘇聯共產黨之中，其政治原因便在於此。

但自 1925 年起，特別是從 1927 年托洛次基等左派反對派在組織上被完全擊敗以後，「個人崇拜」的內容及其實施方向便不同了。最初的內容是造成對列寧的崇拜來打擊托洛次基，後來，一俟托洛次基